

準確判斷政情 冷靜應對競選

周八駿 資深評論員

在香港經濟和民生的議題上，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必須較之反對派政治團體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既不與反對派政治團體競爭政策主張更「民粹」，又不簡單地否定對方政策主張中的合理成分，而是提出全面切實可行的政策主張來爭取香港居民（選民）認同。

香江透視

以1991年香港立法機關引入地區直選以來兩大對立政治陣營所得選票比率之穩定性而言，香港政治形勢是一直不利於愛國愛港陣營而有利於反對派。

然而，以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為主線，結合香港回歸祖國的漸進過程來分析，則看得清：近20年來，兩大對立政治陣營所得選票大體穩定的比例背後是香港政治態勢已展開並正在進一步展開的深刻變遷。

不少人以為當前香港政情頗相似於2003年上半年，其實，有明顯差別。

2003年6月30日CEPA簽署緊接七一遊行，十分弔詭的現象所折射的是，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開始由第一階段（只強調「兩制」差異而無視「一國」）向第二階段（經濟講「一國」，政治依舊強調「兩制」差異）轉變。

香港正處於重要的轉折期

從香港回歸祖國是「承前」向「啟後」轉變看，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聯合聲明簽訂至2002年6月30日特區第一屆政府任期屆滿是「承前」，亦即盡可能保留九七前的一切；而2002年7月1日特區第二屆政府開始推行主要官員政治問責制，緊接着開展《基本法》第23條規定的本地立法，則是由「承前」開始向「啟後」轉變。

香港回歸祖國由「承前」開始向「啟後」轉變，與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由第一階段開始向第二階段轉變在同一時間點揭開帷幕，不是巧合而是歷史必然。在歷史重大轉變時期，代表傳統和習慣的勢力往往強過代表前進方向的勢力，2003年11月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二屆區議會選舉反對派取勝便是反映這一點。

儘管過去7年，無論「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還是「承前」向



今年將進行特區第4屆區議會競選和特區第4任行政長官選委會競選。圖為行政長官曾蔭權會見區議會主席及副主席，聽取他們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啟後」轉變，香港都走了頗曲折的路。而今，二者卻都處於具里程碑意義的轉折點。

目前，香港社會關於「一國兩制」的認識和實踐大體仍處於第二階段。但是，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不可阻擋不可逆轉的一體化大趨勢正愈發猛烈地動搖着仍強調「兩制」政治差異、企圖將香港政制與西方接軌的勢力。

雖然多年來盡可能平穩地推動「承前」向「啟後」轉變的艱苦努力遭遇了嚴重挫折，但是，種種「諷規備隨」的舉措或失敗或失效，加之香港與國家主體經濟融合滾滾向前，使香港越來越多居民明白——既不可能回到過去，也不可能再走老路。

競選的話語權更難掌握

誠然，眼下，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步履艱難；香港社會既普遍歡迎國家「十二五」規劃支持香港未來經濟社會發展的措施，又開始滋長所謂「被規劃」情緒，並且，在新移民是否應該分享特區政府由18歲及以上永久居民每人派發6000港元上形成社會分化。無論是由經濟講「一國」政治仍強調「兩制」差異轉變為認同和接受「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和基礎，還是由「承前」轉變為「啟後」，即開啟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新紀元，香港都正處於十分關鍵也十分艱巨的關頭。

在如斯政治環境迎接2011年11月特區第四屆區議會競選和12月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競選，愛國愛港陣營所處位置既較之2003年有利——「一國兩制」偉大事業和香港全面回歸祖國較之7年前是顯然推進了，又較之2003年不利——政治上敵友分際十分複雜，競選的話語權和公共議題的設定權很難掌握。

政府務必提高管治能力和施政水平

政治形勢越複雜越艱巨，政治頭腦越要冷靜。

對於2011年4月至12月的香港政情演變必須建立客觀全面清醒的判斷。當前香港政治的中心問題是特區政府務必明顯增強管治意志，明顯提高管治能力和施政水平。為爭取選票，反對派政治團體必定千方百計向特區政府發難，這是無法改變也無法迴避的。能夠改變也必須改變的是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香港未來3個月至9個月的政治形勢是否向着有利於愛國愛港陣營選情的方向演變，取決於特區政府的管治和施政。

2003年上半年，反對派直接把矛頭指向了中央。7年後的今天，反對派依舊存對抗或反對中央之心，也依舊企圖煽起香港一部分居民（選民）對國家執政黨的敵意或不滿。對此，必須有足夠的警惕。

在香港經濟和民生的議題上，愛國愛港政治團體必須較之反對派政治團體站得高看得遠看得深，既不與反對派政治團體競爭政策主張更「民粹」，又不簡單地否定對方政策主張中的合理成分，而是提出全面切實可行的政策主張來爭取香港居民（選民）認同。

悼蔡渭衡兄

吳康民

蔡渭衡兄走了，作為老朋友，作為陸羽茶室每周相聚並肩而坐的老朋友，感到非常難過。

蔡兄雖然長我幾歲，但我們都是「八十」後。我曾公開表示過，人生年到八十，「成績」應屬甲等，即A級。但八十只是A-，八十五是A，到九十年，便是A+。

古人說「人生七十古來稀」，今天該是「人生八十不稀奇」，蔡兄早逾八十，已接近A+，也算高壽了。

蔡兄與我，均有旅遊興趣。上世紀90年代，曾攜手同遊美加、古巴數十天，又曾同遊波羅的海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白俄羅斯諸國。進入新世紀，大家年事已高，遠遊不再，但也去過韶關、湛江等短距離景點。到了近年，他行動不便，只能赴長洲作一日遊了。前年徐展堂兄，曾約同我們幾位老朋友作歐洲壯

遊，我說大家都已是「八十」後，歐洲太遠，不如遊一趟日本算了。想不到徐兄正當壯年，去歲先我們而去。往後蔡兄頻頻出入醫院，出院之際，還勉強參加我們聚會，今年終於仙遊，能不令人浩嘆。

蔡兄長年服務英資機構，但愛國之情不減。67年曾遭港英當局囚禁，原因便是他長期主持歷史悠久的愛國社團華人革新會。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蔡兄當選代表，與我共事。蔡兄與我，同心（愛國之心）、同事（全國人大代表）、同遊（攜手遠遊）、同敘（陸羽茶友），這個四同，難得幾人有！

蔡兄哲嗣，孝順有加。當世以兒子而常陪老父左右者較少，想必他日常身教親於言教。願蔡兄兒孫們繼承愛國愛港事業，並加發揚光大，蔡兄諒必含笑九泉，我輩也讚曰：孺子可教也。

兩岸軍事互信有利和平發展

謝緯武 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理事 香港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首屆副會長

日前公布的《2010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首次明確提出，兩岸可以適時就軍事問題進行接觸交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問題。筆者家族布國共兩黨，跨海峽兩岸，自少年時起親瞻兩岸分裂、對立之苦，也經歷爭取兩岸和平統一，消除政治思想隔閡、敵對之時代大幸。作為億萬歷史見證人之一，筆者深感國防白皮書首提兩岸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是極為適時、極為必要的。

1949年到1978年近30年中，兩岸政治對立，軍事對抗。1979年至今30多年中，兩岸各自內部政策有重大調整，其中1979年大陸提出「和平統一」對台方針，1987年台灣開放老兵返大陸探親，1991年台灣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自此以武力消滅對方以實現對全中國統治已不是兩岸雙方的目標，但兩岸戰爭狀態仍未結束。

自1988年以後20年中，由於李登輝、陳水扁的「台獨」政策，兩岸由爭奪對中國的統治權向破壞與維護中國統一之性質轉化，雙方軍事關係一度劍拔弩張。2008年馬英九的國民黨重新執政，執行「不統、不獨、不戰」政策，兩岸關係改善，但分裂與反分裂鬥爭仍繼續，兩岸戰爭狀態依然。

兩岸軍事互信提出適時

現在提出兩岸軍事互信何以適時？

首先，兩岸平等協商，兩岸加強互利合作，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已成為兩岸民眾的民意主流。2006年4月26日中共總書記胡錦濤會見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時指出，求和平、促發展、謀合作是時代潮流，應是兩岸關係發展的主題，這已為4年多來的歷史發展所證實，成為

自2009年6月起，台灣經濟部門宣布開放陸資入台，兩岸投資關係出現由單向到雙向的重大轉折。

2010年9月《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框架協議》正式生效。這標誌着兩岸經濟關係進入制度化合作的歷史新階段，意義深遠。兩岸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進一步加深，雙方在資源優化配置和產業結構整合方面廣泛合作，兩岸已成為密不可分的利益共同體。

兩岸各界交流廣泛開展，基層民眾直接交流，奠下堅實的民意基礎。僅2009年，兩岸人員往來達到540萬人次，創歷史新高。大陸居民赴台旅遊參訪和旅遊突破93萬人次，首次來大陸的台灣民眾達33萬人。

軍事互信可務實推動

台灣傳媒、軍民各界高度關注北京發放的國防白皮書。

台灣軍事發言人當天回應表示，台灣軍方將以穩健務實及循序漸進方式推動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這是國共兩黨、兩岸人民都歡迎的台灣軍方態度。雖然「先經後政」，但也應不失時機地開始兩岸政治協商而不能「只經不政」，老是「維持現狀」。看來政治協商的可行路徑似乎是：以兩岸建立軍事互信為開端，繼而協商終止敵對狀態，然後簽訂和平協定，結束中國內戰。這是否就是通過和平談判結束內戰的順理成章的合適步驟？此有教於兩岸政治家、軍方及同胞們。

筆者家族兩岸親友也和兩岸所有同胞一樣，期盼着兩岸軍事互信早日建立，兩岸和平發展，中華民族早日實現偉大復興。

東亞格局轉折點出現

何亮亮 鳳凰衛視評論員

冷眼向洋

日本「3·11」大地震引發的海嘯、核洩漏危機，重創了日本，日本首相菅直人稱之為國難。

日本當時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國家，大和民族以30多萬平方公里的列島國土和幾千萬人口，在明治維新以來的一百多年時間裡，先後締造了驕人的紀錄：打敗沙俄和清，武力擴張佔領亞洲大陸部分地區、以美國為對手縱橫太平洋遼闊海域；二戰戰敗後僅僅20年的時間就以和平的方式崛起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這百年裡，大和民族顯示了堅韌的意志和紀律、善於借鑒先進文明為己所用，日本的軟實力在亞洲首屈一指，日本人的教養也為人稱道。

領導救災 日本精英無能

這次日本遭受了巨大災難，日本民眾面臨災難沒有慌亂，社會秩序井然，使國際社會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反映了日本百年來社會建設的良好一面。

然而，與人們的期望相反，日本的社會精英在災難面前，卻是驚慌失措、反應遲鈍，不僅無力為災民及時提供援助，在核洩漏危機的處理中更是既錯失良機，沒有在第一時間採取有力措施堵塞核洩漏，又沒有及時向外國要求提供援助。日本人的民族性，是不給別人添麻煩，這在正常的生活中是美德，在大難當頭的時候，民眾卻必須依靠政府的援助，這是政府的職責。而日本首相卻在災後兩個星期才前往災區視察。日本災民和其他國家的災民一樣，在痛失家園、失去親人之際，需要領導人前來安慰和幫助，但是日本領導人卻遲遲沒有出現在災區。日本是高度發達的社會，各種物資充裕，災後日本各界和企業以及外國都捐獻了大量救災物資，但是運送這些物資卻十分緩慢，以至於以忍耐力著稱的日本人也對政府發出了怒吼。日本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救災中沒有充分協調和合作，也阻礙了救災，反映出日本行政體制的弊端。

20多年來日本政壇風雲多變，幾乎每年換一個首相，08年又首次出現了民主黨政府，執政超過半個世紀的自民黨下台。民主黨高層沒有行政經驗，菅直人呼籲在野的自民黨加入「救國內閣」，共赴國難，但是被自民黨所拒。即使是民主黨內高層的同志，也沒有人出來與菅直人共渡時艱。可見日本的政治精英完全沒有凝聚力，完全沒有「救國」意識。

核洩漏 自衛隊無力應付

日本自衛隊，雖然被譽為亞洲裝備最精良、素質最好的軍隊，在這次救災中雖然也有不錯的表現，按照軍事專家的評價，日本自衛隊雖然出動太晚（並非自衛隊本身的原因），如果將救災視為作戰，則自衛隊應付常規戰尚合格，如果是應付超限戰就完全不合格。也就是說，如果面臨非常規的作戰，日本自衛隊能否承擔衛國的重任、能否戰勝敵方，是一個大問號。有人說如果中日開戰，日本能夠迅速擊敗中國，這當然是一個偽命題，然而從中日軍隊救災的效率而言，也可看出高下。《漢和防務評論》總編輯平可夫從當年蘇聯軍隊在切爾諾貝爾救災的勇於犧牲反觀今日日本自衛隊的貪生怕死，也不無道理。今日的日本軍隊，已經不具備「神風隊」的犧牲精神。

從媒體報道來看，日本社會首先是政府系統，或者是執政精英缺乏危機意識和堅強的意志，缺乏高效的行政能力，用紐約前市長朱利亞尼的話來說，日本需要一個振臂一呼、安定各方的領袖，但是日本沒有這樣的領袖。這已經不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日本社會、大和民族的問題，這就是由於長期處於美國的保護之下，日本社會已經習慣於安逸的生活，執政精英只有政客沒有政治家，遇到重大的危機，這一致命弱點就暴露無遺。日本人歷來有強烈的憂患意識，近年來一些日本評論都發出了「日本崩壞」的慨歎，這一慨歎在這次國難中成為現實。

中國領先東亞 大局已定

其實所謂日本崩壞，就是日本在走下坡路，日本並非從此一蹶不振，但是日本的黃金時代已成為過去，大和民族作為單一民族而又人口持續減少，年輕一代不思進取，日本不僅無法保持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災後的重建也比阪神地震之後的重建更困難、費時更久，因為核危機的處理猶如望不到盡頭的隧道，既使日本社會惶惶不可終日，也使周邊國家必須隨時應付可能的核輻射危險。

從19世紀後期開始，日本一直在東亞雄稱第一。二戰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開始打破這局面，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出現中日雙峰格局，朝鮮半島作為整體雖然無法與中日抗衡，但韓國的經濟發展實力與朝鮮的核武器，卻都顯示出朝鮮（韓）民族的爆發力。東亞主要的三個板塊，日本、朝鮮半島和中國，從去年的天安號事件和今年日本的國難，以及在中國在經濟總量與國際影響力方面來看，中國都已經超越日本，成為東亞之首，這是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這一態勢對於天下大亂的世界格局有何影響，更值得研究。

將「忙到死、做到癩」放進博物館吧

彭兆威 職業新文化召集人

民筆聊生

「忙到死、做到癩」已經不只是香港上班一族的工作寫照，還演變為香港這個24小時永不休息的國際大都會的主要病徵。不知道從甚麼時候開始，「休閒」早已成為打工仔女的原罪，「忙碌」才是在職人士應有的工作生活。面對繁重的工作壓力，抑鬱症不知不覺間成為香港最常見的情緒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預測，十年後抑鬱症將會成為全球第二大的疾病。故此香港人還能夠對「忙到癩」的工作生活掉以輕心嗎？

回望我們的上一代，就如任達華及吳君如在電影《歲月神偷》中飾演的一對鞋匠夫婦。面對問題叢生、百廢待興的香港社會，為了生存，就是通宵達旦、不眠不休地工作也視作等閒；就是十級颱風來襲險毀家園，也是無怨無尤，始終刻苦耐勞、默默耕耘。因此當80後埋怨工時長，多OT時，上一代很容易就會斷言現今的年輕人實在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好食懶做。對於部分上班族一族因為抵受不住工作壓力而產生抑鬱等情緒病，部分長輩更會嗤之以鼻，責之為「唔夠硬淨」。然而問題在於，香港人到底追求一個怎樣的生活？

滄海桑田，斗轉星移。今天香港的成就已媲美英、美等先進國家及地區。香港人均GDP超過三萬美元，居於世界富裕經濟體的前列，是世界公認的富裕社會。香港的實質人均GDP從1996至2006年的十年間增長了34%。現今政府財政儲備更高達5,916億港元。在堆積如山的財富底下，諷刺的是香港也擁抱世界級的長工時。

2010年香港接近280萬的上班族中約150萬名每周工時超過44小時，當中超過35萬名每周工時更至少56小時。以一周工作6天計算，即平均每天工作逾9小時。

無可否認，香港工時之長早已舉世聞名，毫無爭議。香港上一代基於物質缺乏，「今日唔知聽日事」，故此縱使犧牲個人健康及與家人相聚時間也堅持全年無休，有得做打死都要做。

然而這是香港七十年代工業起飛極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時代，香港還有一條《婦女及青年（工業）規例》規管全港女性及16歲以下青年的工作時間不可過長，以保障他們的身體健康。但今天的香港僱員為甚麼又要如此這般的被迫搏殺工作呢？標準工時又要到何時才能立法？特區政府又會有甚麼措施政策保障全港打工仔女的身心健康呢？

時代在進步，生活要改善。特區政府高喊經濟轉型十多年，近年強調變身為國際金融中心及發展六大優勢產業。一言以蔽之，就是要「食腦」、不再「食力」。因此，過去及現今「忙到死、做到癩」的工作生活形態應該放進香港的歷史博物館裡收藏，取而代之的是推廣一種顧及家庭與生活的健康工時，讓打工仔女不需再被長工時所束縛，個個抑鬱成狂，淪為有錢但不快樂的香港人。